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风起云涌的日子（上）	蒋国辉
【书刊评论】	值得一读的《唐平铸文革实录》	余汝信
【史海钩沉】	从周总理的反常行为探寻林彪叛逃真相	王贵成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六）	吴中杰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风起云涌的日子（上）

· 蒋国辉 ·

一、天降狂飙

目前，坊间研究文革和回忆文革的文章已如恒河沙数，而文革的分母是以亿为单位的，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包括我这样的小人物，关于那段历史，从个人叙事的角度也有数天数夜的故事。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和那个时代所有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年轻人一样，深感幸运。在长期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由衷地向往革命。可是，红军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万里长征我们错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全是先烈们气吞山河悲壮辉煌的战斗历史，一切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机会都已不复存在，留给我们的除了对先辈们的无限崇敬，好像就只有遗憾了。

当学校宣布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学生们几乎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终于赶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我们成了大革命的参加者，今后，我们也可以像老红军给我们讲长征故事那样，给我们的后代讲述这场伟大的“革命”。

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我们这些小人物并不清楚，后来知道，其实相当多的高层人物也不清楚，甚至到现在，对文革的评价还处在一种完全撕裂的状态中。我们非但不知道文革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更没有人会料到，我们中间好些人为“革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以后却没有成为烈士，曾经渴望在后代面前彰显“自豪”的机会和资格都一并随着年轻生命的消亡而消失了。

当年，和我一起就读西南师院附属中学的同班同学杨宏谦，文革前期我们在同一个组织里。1967年武斗中我们撤离学校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大包衣服寄放在我们家里，原想

等着革命胜利后回来取。我妹妹把他的衣服洗干净叠好等他回来拿走，可是他再也没能回来，他在武装支援泸州的炮火中被打死了。而今，文革似乎已经远去，留在我们这些亲历者记忆中的这段历史，充满了辛酸、冤屈和泪水。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那时提倡关心国家大事，阅读报纸上的学术讨论文章——不管懂不懂——成了我的习惯。因为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所限，对那些文章我不曾也不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更不可能想到会由此引发一场让全民族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灾难。到我们中学快毕业的时候，革命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平面媒体的大批判上，国家作出规定：所有学校一律停止期末考试，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停止升学考试；大学毕业生暂停分配工作，留校搞文化革命。至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模式。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革命初期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破四旧”，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反“封、资、修”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这一次的态势是“不周山下红旗乱”、“横扫千军如卷席”。一时间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全都指向了教师，批判点基本落实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崇洋媚外的言行；以及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线不清”等等问题上。我校的学生也给所有的老师都贴了大字报。

被贴大字报最多的是一位叫陈廷智的化学老师。这位老师是西南师院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以他优异的成绩本应分配更好的工作（比如留校），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被分配到了中学。怀才不遇的他常常口无遮拦地发牢骚，比如对多年不加工资，他说，大学生的工资是永远的“梭多梭（51·5元）”。其实，他的情况可能和我的五叔（1960年代前期毕业于西南师院数学系的高材生，也是一名中学教师）一样，天生就是那些“根红苗正”的领导反感的对象，何况他嘴上还没个把门的，留下了好些“攻击社会主义”的把柄。

文革初期，并非后来很多人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是红卫兵乱哄哄地造反。此时，一切都还处在党委的领导之下，中学生集中火力攻击教师，也是校方安排的，领导正好借文化革命的强劲东风，发动和利用学生的力量来清除陈老师。中学生是一个多么简单容易冲动的群体，群起而攻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很快，陈老师被炮轰成了罪不容赦的“坏分子”，学校领导宣布开除他的公职，遣送他回农村老家。

陈老师曾经教过我，他的教学水平确属一流。开除公职不但让陈老师倍感屈辱，而且还让陈老师走投无路。倘若，陈老师能预计到文化革命稍后的发展势头，就应该庆幸自己的遭遇其实是因祸得福——早早被遣送走了，或可躲过后面源自学生的“暴力”革命。要是他能熬着，他就能看到千千万万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人或比他更加不幸，在一个巨大的苦难群体里，他的苦难将被相对缩小，如此，他或许能挺过来（就像我的五叔，熬过那些风雨如晦、锥心刺骨、泣血涟如的日子。待到国家发生重大历史转折之后，平反，复职，还被评为特级教师，让自己的生命价值最终得到完满的体现）。可是陈老师万念俱灰，承受不了如此绝望打击的他，跟那个年代千千万万被侮辱被损害的知识分子一起，含冤自尽，离开了人世……

在中学里，贴大字报渐渐被归于“温良恭俭让”弃之不用了，学生们对老师的暴力行为瘟疫一般流行起来，许多老师被批斗侮辱毒打，打伤打残乃至打死的事件时有发生。重庆24中一位全北碚区教学效果最好的中学数学教师，在批斗中被他的学生活活打死（具体过程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如今，这些逝去的老师，都只存在于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序列中，而当年，作为血肉之躯，他们遭受的是令人发指、惨不忍睹、血肉横飞的肉体折磨。

不久（应该是工作组进驻了学校），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学校被批斗侮辱得最厉害的，是徐祥恕老师（校党支部委员兼校团委书记）和杨绍芙老师（校党支部副书记），为什么是她们我不太清楚，可能因为她们俩既是教师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生们被“以革命的名义”煽动起来的怒火，便烧向了她们。她们被绑起来，脖子上吊了几块砖头；后来又被推进荷花池，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再后来被许多人按住，强行剃了“阴阳头”。

我当时也在人群里。其实，两位老师和我从未有过任何直接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也许是长期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教育，人性中恶的一面被鼓励激化发酵膨胀到极致，头脑简单的中学生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看成了最正常的事情；也许是自己中学期间一直生活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因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歧视和欺凌。此刻，眼前突然有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渠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此时，被激烈情绪充斥的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思考，不管对象是否曾经对我造成过伤害，也不管以这样的方式发泄报复情绪是否道德，就参与了。

文革后期，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我对两位老师满怀真诚的愧疚，但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达我的忏悔。我在煤矿当矿工时，我弟弟在西师附中读高中，徐祥恕老师恰好是他的班主任。某一次我回家探亲，和弟弟上街碰见了徐老师。我鼓足勇气前去向她问好，恳请她原谅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对她的伤害。

徐老师十分惊讶，她问，那次你也参加了吗？原来，混乱之中，她根本没看清是哪些人在推搡她。不过，也有可能是她宽容大度不愿再翻晒这些陈年旧账，故意将往事淡化。毕竟，那时的我们还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老师以她的仁慈宽厚原谅了我们。

大字报的狂热还没褪去，更疯狂的“抄家”又开始了。“抄家”在中国历史上被封建统治者百用不厌，而这种真正的四旧，文革中不但没有被“破”，反而成了当时“破四旧”的有力武器。文革中，“地富反坏右”的家、“资本家”的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家，以及任何革命群众认定“有问题”的家，全都是抄查对象，涉及的何止数以万计平民百姓；被抄查没收的“四旧”，是被定性为“封资修”的书籍，民间收藏的古董字画、金银珠宝首饰、工艺品、贵重的丝绸毛料衣服、面料等等。有的家庭连基本生活用品都一并被拿走，变得一贫如洗。很多抄查的物品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据我所知，最初的抄家活动，是自上而下有组织开展起来的。那时学校刚放暑假，我所在的城市，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兴起，文化革命高潮还没到来。这段时间的文化革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因放暑假回到家里的我，某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参加西师家属委员会组织的革命行动。

我在学校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达三年之久，因家庭成分问题一直被拒之门外。所以，接到家属委员会的通知，对他们把我当成“革命中坚力量”这件事特别困惑。那天，我被招到家属委员会开会，同时去的还有几个学院厨工的子女（除我之外都是红五类）。召集会议的是北碚公安分局天生派出所派来的一位便衣公安人员王同志。他说，要把西师家属子女中可靠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并不叫红卫兵），对西师院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行动。在王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开始了对“地富反坏右”的革命。

我们“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抄家”。王同志和家属委员会研究决定被抄的对象后，就布置任务，让我们去实施。总共抄了几家我不记得了。印象较深的有两家：一是中文系的一位姓李的老师家；一是外语系的何先生家，这两家我都比较熟悉。

为什么要抄李老师家我不知道，抄何先生家是因为“领导”告知何太太是漏网的地主分子。记得我们在何家翻了半天，也没有翻到什么足以证明何太太地主身份的东西，快要离开的时候，才突然在灶门里发现了一卷纸，拿出来一看，上边有“卖荒山文契”等字样。我们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看了很多诸如《槐树庄》《夺印》之类的电影，变天账这些词汇在脑子里烙印深刻，但真正的“变天账”谁也没见过。

我们只凭那卷纸上写着“卖”“荒山”“文契”几个“关键词”，就以为找到了地主的“地契”“变天账”之类的东西。这一下，派出所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抄家行动“成果辉煌”，这个成果不但坐实了何太太的漏网地主身份，还坐实了她藏匿“变天账”与无产阶级政权为敌的“证据”，何太太因此拥有了“右派”和“漏网地主”双重身份，之后长期被批斗、劳改。

我在派出所和家属委员会组织的这个“革命队伍”里并没有待多久，大约一个多星期吧，我被举报不是“红五类”出身，派出所的王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就让我离开了。此后，我再也没参加过这一类的“革命行动”。

二、南来北往

重庆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据说是重庆市委统一组建的。加入红卫兵也有严格规定——必须是“红五类”家庭出身。之前，我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入团，此时自然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不过没多久，又成立了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的外围组织，吸收我们这种想革命又没有资格参加革命组织的人，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目的。

虽然都是革命组织，区别却很大：红卫兵们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赤卫军们则在胸前挂一块汽车月票大小印有赤卫军字样的红色牌子。不同的标记反而让人一眼就能判断你的出身，更把我们那一代人最希望作为隐私的东西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参加了赤卫军，内心却非常抵触这块牌子，只在北京天安门前照相时戴过一次。后来“思想兵”作为保皇派垮掉了，赤卫军也随之烟消云散。

重庆“思想兵”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首都红卫兵”（当时的造反派首都三司）已作为“革命的火种”从北京撒向全国各地，北京的造反派也来到重庆传播革命经验。在首都红卫兵的鼓动下，重庆市的大中学生——很多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或没能参加“思想兵”——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重庆最早组织起来影响较大的造反派组织，有重庆大学的“八。一五战斗团”和西南师院的“八。三一战斗纵队”。

北京学生南下不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和关系较好的同学相约，一行四人出去串联。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这是那个年代革命青年心中最神圣的一件事。

来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第一次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汇有了如此真切的感受，如潮的人群从火车站漫到了两路口街道上。那个情况下，谦谦君子就永远只可能是个看客。我们从两路口缆车站开始，不管不顾左冲右突，招来了不少白眼和谩骂，最终，大汗淋漓地站在了站台上。

到了站台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火车鸣响汽笛吭哧吭哧喘着粗气进了站还没停稳，成百上千的人就扑向了火车窗口，还有人潮涌上来把站在前边的人挤下铁轨的事件发生，真是触目惊心！

火车进站后列车员不开车门，只把车窗打开，然后回到自己小房间把门一闩，任由车外的人从车窗爬入，直到车厢变成沙丁鱼罐头。那个混乱拥挤是无法复制的绝版：车厢里座椅下躺着人，行李架上卧着人，厕所里和车厢接头处人贴人，在车上想挪动一下，就只能从人头上爬。

当时背着铺盖卷的我们是怎么挤上车，而且还很幸运地坐在了座位上，全都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四天四夜我们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和水，谁也不敢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稍稍欠欠屁股，座位就可能立即被挤占。到达北京，已经是第五天晚上八点左右。

走下火车，站在了所有人激情向往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我们却没有欢呼雀跃的冲动。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随着下车的人流出了车站，看见了“永定门车站”几个大字，又听见车站的高音喇叭呼喊：到北京串联的革命师生，请往先农坛体育场等候安排。

来到先农坛体育场，放眼望去，那阵势就是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的北京版：场外人头攒动，场内摩肩接踵。我们在体育场外转了半天也没看见搞接待工作的人，有点傻了。天完全黑下来，11月中旬的北京，夜晚的风对于南方人已经有点刺骨，必须尽快找到接待站。我们再次不管不顾地往里挤，进了体育场才打听到需要先凑够20—30人，再去体育场的接待站登记编号，然后等着，叫到号便会有车送往食宿的地方。

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倒是源源不断，没多久我们就凑成了30人的小组，登记后被编到2500多号。当时广播叫到一千号左右，大约每过5分钟叫一次，这样算下来，我们须等到后天晚上。如此漫长的等待，肠胃首先不答应，于是，我们跟同组的人打了招呼，离开体育场去找饭吃。

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饭，想想体育场那个阵势都头疼，谁也不愿意回去等，我们随意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随车观望北京夜景，看着看着，以往从图片和电影里熟悉了的天安门突然出现在眼前，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我们当即下了车，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无限崇敬地仰望着天安门，觉得自己也崇高起来了。

离开天安门后，我们继续闲逛，逛到一栋白色大楼附近，近前一看，才知道这里是北京市委。大门洞开，没有岗哨，我们毫无阻拦地走了进去。开始只是好奇，进去以后发现那里边已经睡了很多，看样子都和我们一样，是等候接待的外地人。我们顿悟：这里是过夜的好地方啊！安静且暖和。不过，能睡的地方都睡满了，我们不甘心，终于在地下室里找到一间空屋子，打开自己的铺盖卷倒头就睡了。

这一倒下去，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待大家都睡到自然醒，收拾好行李走出去，才知道已经中午12点了。午饭后，我们算了算，带的钱和粮票有限，不可能不依靠接待打持久战。商量了一阵，决定去北大碰碰运气，或许北大可以直接接待呢。

到了北大才发现打错了算盘。我们在校内转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接待站，里面住的外地人全是被先农坛体育场安排来的。更沮丧的是，北大校园里但凡能住人的地方，都被塞得

满满的，想找个墙根靠着坐一晚都不行。眼看天色已晚，只好打道回府，又在市委大楼那间地下室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返回先农坛体育场，迎接我们的是当头一盆冷水，广播里已经叫到三千几百号了，我们已经错过了自己的号。那感觉就像突然被抛弃在了荒芜人迹的地方，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串联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涌入，凑人数重新登记不难，难的是必须老老实实在这里坐等几十个小时，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忍着、熬着。

万般无奈的我们在体育场里瞎转悠了一阵子，一个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原来每一组那个公推的负责人并不认识自己组里的成员，只是负责清点人数而已。我们看准一个面目和善的年轻人，前去恳请他把倒霉的我们也算入他负责的小组。他十分爽快，让我们上了他们那辆车，被送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

住在接待站，吃饭不要钱了，我们需要操心的只有三件事：

头等大事当然是等待毛泽东的接见。不过，这是只能被动等待不能主动去做的事。

第二件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学（主要是北大和清华）去看大字报。那时北京的各种消息对我们这些从边远省份来的中学生，很有吸引力，我们不辞劳苦认真抄了不少大字报。

第三件就是去看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我们的乘车卡只在城区内生效，长城和十三陵都属于北京的远郊区，没有自费能力的我们只好放弃。北京城内的古迹故宫、颐和园等，因“破四旧”而关闭了，剩下的只有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印象最深的是景山公园煤山上崇祯皇帝自缢的那棵树，时光流逝几百年，这棵老树尽管不再枝繁叶茂，却还顽强地站立着，让此时的树下人陷入沉思。

余下来的，就是等待那个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件事，国家的安排也煞费苦心——何时被接见，须等到前一天晚上才通知，让“别有用心的人”没有机会对伟大领袖的安全造成威胁。

我们在11月25日晚上9点钟左右接到被接见通知。在北京的外地学生，一旦接到通知马上被军管，编成连排班，排长以上是军人。接到通知后，所有人都不准外出了，被集中在住处进行接见前的纪律教育，教育进行到大约十点钟，宣布睡觉。

事实上，这些应该都是当时的保卫措施，不过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想那么多，只是兴奋得睡不着觉，深夜12点以后还没有静下来。我迷迷糊糊似乎刚睡着，就被叫醒了，懵懵懂懂走到食堂吃饭时，看见挂钟指示4点半。领队的军人告诉我们，需要早一点出发，不然会被人流车流堵在路上，到不了天安门。

吃完早饭，每人又领了两个馒头带上，然后集合，两个人一组互相检查身上有没有小刀之类的铁器。那时的我们，心中只有伟大领袖的安全，所以心甘情愿地被别人搜身，也理所当然地搜别人的身。不知其他地方有没有通过这种方式发现“别有用心”的歹徒，我们那个接待站全都是纯真的革命小将，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对领袖造成危害的东西。搜身之后，所有人分乘若干辆军用卡车出发了。

我们还以为自己是最早的，出去一看才知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一路上车灯闪烁，喇叭长鸣，人声鼎沸。我们的车走走停停，到天安门附近已经是八九点钟了。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走了近三个小时。

我们被安排在北京电报大楼前沿街边坐下，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等待。这一天以什么方式接见：是我们列队从天安门前走过向城楼上频频挥手的毛泽东致敬，还是毛泽东乘车从我们面前经过，不得而知。

五六个小时在我们的企盼中慢慢流过，我们无怨无悔地等着，因为接受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接见在当时是人一生最幸福、最重要的大事，为此我们可以牺牲一切，区区几小时的等待又算得了什么？反过来说，伟大领袖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百忙之中还要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我们除了激动、兴奋、幸福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想法吗？这是当时我们无比虔诚、无比单纯的全部内心活动。

但是，灵魂的虔诚却把握不了肉体的新陈代谢规律，刚开始各个队伍还比较有秩序，个把小时后有人需要方便，附近又没有公共厕所，来来回回队伍就有些乱了。军人们竭力维持，但没有经过严格纪律训练的革命小将显然耐性不够，几小时之后基本乱了套，军人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只要不越过警戒线便不干涉。

12点钟左右，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人人都清楚的领袖出场信号。军人们迅速行动，强力整顿队伍，散开的人也赶紧归队，生怕错过。待到整顿就绪，音乐却停止了，原以为马上就要进入角色，殊不知紧张了近一个小时，一切归零回复原状。革命小将再次松弛下来，队伍冰消雪融一般四处漫溢。

两点钟左右音乐声再次大作，沿街坐在最前排的军人们刹那间手挽手组成了一道人墙。这次是真的了，反应快的纷纷站起来往前涌，队伍完全没有了，只有汹涌的人潮。我们几个算反应比较快的，冲到了靠前的地方，只见几辆满载军人的卡车开了过去，后边不远处跟着几辆敞棚轿车，其中一辆上站着毛泽东。他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脸黑黑的，一点表情也没有。跟在后边的车坐着林彪和周恩来，一晃就过去了。我还清楚地看到了坐在第四辆车上的刘少奇。他也跟毛泽东一样面部没有表情，穿的一身军装让人觉得有点怪异。

整个车队驶过只有短短的一分来钟，反应慢的人被前边的人墙挡住什么也看不见。力气大的，按住前边人的肩头往上撑，看见了一晃而过的车队；更多的人，特别是女生，在人墙后边又蹦又跳，还是什么也没看见。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两个看起来还是小学生的小孩，跑到一旁小便，就在他们方便的那一分钟，车队呼啸而过。等他们跑过来，只看见一堵黑压压的人墙。

其实，如果十二点左右不是“虚晃一枪”，在整顿就绪的队列中等待的所有人毫无疑问都可以满足心愿。但事情的发展和结局总是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美好。车队过去以后，人墙后边不论男女，一律扯开喉咙嚎啕大哭。

接见完毕之后，军人和军车都蒸发了，瞬间不知去向，想来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没有义务再把我们送回去。终于被红太阳的光辉现场沐浴的我们兴奋欲狂，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日记本，激动地记录“1966年11月26日，我在北京电报大楼前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来得知，在1966年的70天时间里，毛主席八次分十批接见了一千二百万红卫兵，我们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批。毛泽东接见完毕后，我们就不想在北京继续逗留了。11月底的北京已进入初冬，我们没有足够的御寒衣服，常常冷得出不了门，而且从来没有独自离家这么远这么久，有点归心似箭了。

四天四夜的返程，仍然是那样拥挤不堪的火车，晚上10点多钟到达重庆火车站，前往北碚的公共汽车已经收班，我们只好在牛角沱、两路口一带逛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才回到北碚。

从北京回到重庆，免费乘车串联被叫停（从外地返回还可免费乘车），“步行串联”的风却越刮越烈。继承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步行串联学习革命经验、播撒革命火种成了红卫兵追逐的时尚。听说有人真的是沿着当年红军从江西到陕北的路线走了，走没走完不太清楚。我们一同去北京的几个同学，没想走真的长征路，但也想出去走走看看，就决定第二次结伴“步行串联”去成都。

九天的行程，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与“革命”没什么关系。途中，我第一次那么实实在在地看到、感受到自己故乡的山和水、风土和人情。我们一路上经过的，都是百年没发生太大变化的典型川内小县城和乡镇，那些陈年老旧的建筑，古朴的民俗乡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几乎所有乡镇以上的行政单位驻地都设有革命串联的接待站，像我们这种步行串联的“革命小将”，即便是出来观光风景的，也可以空手走遍全国吃住不愁。

（未完待续）

□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

## 【书刊评论】

### 值得一读的《唐平铸文革实录》

• 余汝信 •

唐平铸是文革初期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是当时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2019年新年伊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唐平铸两个儿子唐炎明、唐亚明撰写的《〈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内中披露了不少珍贵的新史料，值得文革史研究、关注者一读。

#### 一、一个军队知识分子的命运

唐平铸191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年轻时就读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赴日本勤工俭学。1936年在东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同盟。1937年回国后参加红军，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共。曾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长，二野十二军三十四师政委，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调解放军总政治部，任总政宣传部新闻广播处处长。1954年参与筹办全军性报纸——《解放军报》。翌年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自1959年新军委成立，唐平铸受军委主要领导所器重，作为军队的笔杆子，多次参加了中央军委重要文件、军委负责人讲话和有关各项指示、命令的起草以及军队条令条例的编写等工作。如：1960年，他是毛泽东批准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主要执笔人；1962年，他在为林彪撰写“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目睹了持反对意见的罗瑞卿与叶群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林彪重新拉了“条子”；1964年，他根据林彪接见刘志坚和他本人的口述，起草了经毛泽东肯定的、林彪著名的“突出政治”指示；1965年，他参加了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的起草，他是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的撰稿人之一；1966年，江青、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进行修改和补充，军委让他代表军队参加了整理。此外，他还主持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重要社论、文章和文件的起草、送审。

1961年2月起，任解放军报社党委副书记，名义上为报社第二把手，实际上多时为第一负责人。1966年3月，参加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

1966年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拟派陈伯达率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在外地的毛泽东当日批准同意。6月8日，陈伯达对唐平铸说，他将于次日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由唐平铸来代理《人民日报》工作。6月16日，陈伯达宣布吴冷西停职反省。6月20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唐平铸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

从此，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首先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信息由《人民日报》发布，改变了文革初期许多重大问题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局面。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的“小小政变”是满意的。此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评论，基本反映了毛泽东指导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的思想，表明了他要彻底肃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决心。《人民日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天出报，从没有间断过。唐平铸说，毛泽东不赞成《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他指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三分一下乡劳动，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工作。”一天夜间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吃工作晚餐时，对在场的唐平铸、胡痴说：“我看你们《解放军报》的干部可以一分为三，一部分留下办《解放军报》，一部分来《人民日报》，一部分去新华社。”

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专门召见了唐平铸和《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9月后，人民日报社改编委会为党委制，任临时党委第一书记，再后任临时工委负责人。1967年1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

1967年1月17日，唐平铸受《解放军报》“一·一三”事件牵连，被人民日报社造反组织关押。

唐平铸的妻子陈友孟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林彪是校长。那时女同志少，她又是医生，由于工作关系，和许多领导人比较熟悉，和叶群也有交往。唐平铸被关押之后，陈友孟四处写信申诉，分别寄给了周恩来、林彪、萧华及中央办公厅，还寄给了她早年认识的江青，可是全都石沉大海。

在唐平铸被揪走近一个月后，唐亚明搀扶着母亲陈友孟去“闯”林彪的住地毛家湾。

当时林彪出去“转车”了（林彪有时在震动的汽车里才能休息好，林办的人称之为“转车”），叶群在家。工作人员领母子俩穿过回廊，进了客厅。不多久，叶群进来，和母亲拉了拉手，寒暄了几句，习惯地称她“陈医生”（她在延安女大任卫生科长时，叶群是该校干

部科长)。叶群听了陈友孟述说的情况后,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表态,只是收下了她带来的信。

2月27日,唐平铸被释放,恢复了在《人民日报》的工作。1967年5月1日,按照周恩来批准的名单通知,唐平铸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林彪见到他时只说了一句话:“陈医生的信我看到了。”当天各大报上登出的名单中,又出现了唐平铸的名字。

家里人以为唐平铸的命运就此转危为安,但时隔一年,1968年9月17日,被中央专案组正式逮捕,由中央二办专案组立案审查,1975年5月25日释放,前后被监禁了近七年。

唐平铸被释放后,仍带着“反党分子”的帽子。1975年6月2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在《关于反党分子唐平铸的审查结论》的末尾写道:“唐平铸是个反党分子。按照毛主席‘调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工资照发,由总政安置农场劳动教育”。直到1980年2月,经军委批准,总政才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认定其遭受诬陷,撤销原中央专案组结论,“属于冤案,应予推倒”。1985年7月20日在京逝世,终年72岁。遗言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用作医学病理研究。

文革前与唐平铸同为大校军衔的军队笔杆子,著名者还有姜思毅、钱抵千、陈亚丁等。姜思毅1960年前为总政宣传部部长,受谭政事件影响降为副部长。文革中因是“死老虎”反而少受冲击,后历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钱抵千是《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主要撰稿人,时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冲击。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学院副院长、国防大学副校长。姜、钱1988年均被授予中将军衔。陈亚丁文革前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为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执笔人。因被认定为江青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不知所终。总的来说,唐平铸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在文革中、文革结束后的际遇比姜思毅、钱抵千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不管怎么说,却还是比陈亚丁强得多。

二、《唐平铸文革实录》的主要看点

《唐平铸文革实录》全书共437页,其目录页如下:

|                              |       |
|------------------------------|-------|
| 自序                           |       |
| 第一章 《毛主席语录》诞生、传播始末           | 1     |
| 附:《毛主席语录》主要版本目录              | 4 5   |
| 第二章 “批罗事件”的前前后后              | 5 3   |
| 第三章 李讷在《解放军报》夺权              | 1 3 3 |
| 第四章 扑朔迷离的“揪军内一小撮”            | 1 6 9 |
| 第五章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喉舌 | 2 1 7 |
| 第六章 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民日报》           | 2 6 1 |
| 第七章 唐平铸的“罪行”                 | 2 9 9 |
| 第八章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3 3 3 |
| 第九章 有关林彪与林彪事件                | 3 5 7 |
| 附录 生命的漩涡:我们的父亲唐平铸            | 3 9 5 |

由《解放军报》编辑的毛泽东著作中一些语句的选编本——《毛主席语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奉为“红宝书”，几乎达致全国人手一册，占有特殊的地位。唐平铸是《语录》编辑出版的主要负责人和编者，是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的起草人。本书如实地写出了《语录》产生的背景及经过，由军内内部发行到全国、全世界公开发行的简要过程，写出了是江青提出用林彪的名义写再版前言，并与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人修改、审定的事实，以及《语录》给人们的启示、教训和借鉴。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爆发前中共高层政治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也是军队高层开始卷入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本书披露了1966年3月北京京西宾馆“批罗”会议的内幕，包括唐平铸保存多年、鲜为人知的邓小平主持的“批罗”会议记录，罗瑞卿的检查，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京西宾馆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将帅们的发言等——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动用“枪杆子”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笔者从历史角度探讨一大批党和军队领导人参加“批罗”的深层原因，并分析毛泽东如何用“批海瑞罢官”和“批罗”，从一文一武开刀，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另外也展示了“批罗”会议后，《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及相关背景。

本书引用了胡痴亲笔记述的经毛泽东同意、江青把女儿肖力（即李讷）安插到解放军报社的详细经过。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的谋划下，肖力制造了震惊军内外的“一·一三”事件，从此走上了神坛。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27岁年轻人，把《解放军报》牢牢控制在手中，一跃成为了全军、全国瞩目的人物。唐平铸也为此遭到了厄运。

“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革期间的一个重要口号。1967年8月，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又将提出该口号的责任推到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人头上。时至今日，对这一问题仍然众说纷纭。本书用史料及唐平铸的经历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内幕，指出了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的心态和党内民主的症结。

《人民日报》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本书剖析了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重要社论、评论及文章的起草、定稿及审批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统领着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导向。在指导这场运动的全局性文章、文件中，不仅有他的口述，有他发出的最高指示，有他亲笔写的评论和段落，有他亲自删改、添加的文字，而且重要的社论大多是由他签发的。

本书记述了《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对“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记述了唐平铸由想紧跟、跟不上，到不理解、有抵制，直至被批斗、监禁，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被政治漩涡吞没的全过程。书中也出示了康生、江青相互批示，密谋除掉唐平铸的亲笔信内容。

唐平铸是《解放军报》创始人之一，从创刊起一直担任副总编辑，实际主持了军报的日常工作。他和他几十年的战友胡痴（曾任《解放军报》副总编、总编）留下了大量的笔记、会议资料、申诉信、平反材料日记等遗物。作为唐平铸的子女，本书作者与父亲有过许多次长谈。在唐平铸去世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本书作者也陆续采访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本书即根据这些史料和采访内容，揭示了文革初期中央内部和新闻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事件、问题做了材料补充，有的提出了质疑。本书作者认为，为历史留下负责任的记录，有助于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研究。

### 三、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不是林彪写的

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总政领导上报军委后，由唐平铸将《毛主席语录》前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按照这次全会的决议重新进行了改写，并报请总政和中央军委批准。

文革中被监禁近七年的唐平铸，在释放出来一年后，于1976年10月6日给总政党委的信中写道：“1966年10月间，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看到《解放军报》编辑的、用总政治部名义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她提出改为林彪主持编辑，并令我和胡痴报告总政，把原来的前言改为林彪写的前言。其实这个《语录》编成后，请林彪题字，开始他还不愿意。用林彪名义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是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主持修改定稿的，有些话是康生加进去的”。

1976年11月10日，原《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在给总政党委的信中写道：“1966年底左右，江青在中央文革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语录》的前言要改一下，用林副主席的名义重新发表，这样影响更大。’陈伯达马上附和。江青遂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江青、陈伯达等亲自主持修改。林彪签阅后，让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发表。”

1966年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过的《毛主席语录》前言。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刘志坚（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回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王力以及唐平铸、胡痴等人参加了讨论。会议以唐平铸起草的前言为基础，边议边改。唐平铸做了记录。陈伯达、康生发言最多，成为修改工作的中心。周恩来也多次发言，提出了重要意见，比如“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全面”和“全世界”这两个词，就是周恩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强调写上的。

相比原版的《前言》，修改后的《再版前言》做了重大改动。比如：原版中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伟大”前加了“最”字；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评价。唐平铸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

《再版前言》删去了原版中“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段话。唐平铸说这是康生的意见。增加了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话。

刘志坚说：“江青提出要把《毛主席语录》的前言改成林彪的名义，在讨论时我内心是不同意的，因为写有总政名义的前言《语录》影响很大，不但军队人手一册，而且已发到全国。在会议期间没有找到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论述，只好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我参加了中央文革对初稿的审查，主要是江青、康生、陈伯达谈。以林彪名义的前言是中央文革讨论后决定的。”

根据江青的意见，决定将修改过的前言改名为《再版前言》，署名林彪，落款日期为1966年12月16日。自此以后，再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带有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的新版了。该版可以算作《语录》的第三版，它标志着《毛主席语录》由军内发行转向公开发行。原版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面又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与1965年总政治部的《前言》相比，《再版前言》把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到了更高的高度，把号召全军扩大到了号召全国人民。《再版前言》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再版前言》还写道：“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以林彪的名义写的《再版前言》，19日又发表了《句句熟读 句句照办》的社论。社论说：“在我国人民喜爱的宝书《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时候，林彪同志为它写了前言，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地刻苦学习，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唐平铸在交代材料中写道：“我奉命于12月16日晚赶到林彪处，请他审定和签阅由中央文革主持、以林彪名义写的《再版前言》。其实，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开始时连为《语录》题字都要我们一再请求，再版前言也不是他写的。军报12月19日社论里林彪的一些话，是我到毛家湾请示时，林彪当面说的。回到报社后我立即向刘志坚作了汇报，并报军委总政和中央文革。当晚，我主持起草了《句句熟读 句句照办》的社论。12月17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以林彪名义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2月19日军报社论见报。”

举一反三，可以想见，几乎没有任何以林彪名义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章、指示，是林彪本人写的。这些讲话、文章、指示里，有多少真正是林彪本人的东西？值得研究者认真深入探究。

#### 四、《唐平铸文革实录》中最具价值的材料

唐平铸参加了1966年三四月间京西宾馆的批罗筹备会和大会。作为《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和军内的笔杆子，他被要求参加会议和听取讲话。在他保留的京西宾馆会议和领导人讲话记录里，记载着林彪对会议的具体指示，详细记录了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叶剑英和一大批将帅的多次发言，以及罗瑞卿的检查和申诉。这是文革期间，唐平铸的亲属在他被揪斗、抄家时秘密转移到外地的一本保密笔记。这个本子现场记录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参加的筹备会和高层会议的情况，与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有限的回忆、分析和口述文章的区别在于，在罗瑞卿档案未予正式公布解密之前，这个记录本真实、详细披露了会议情况，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事件的发展脉络。另外，唐平铸还保留了些与该事件有关材料、文件，这些都是研究“罗瑞卿事件”，研究毛泽东依靠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史料。

上述有关发言证实，到了1966年2月至4月期间尤其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后期，在毛泽东的引领下，对罗瑞卿问题基本上已形成党内、军内最高层一致的批判性共识。

官方有关罗瑞卿生平的代表作，首推以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名义撰写、作者署名黄瑶、张明哲的《罗瑞卿传》。据官方称，该书由总参谋部批准撰写，在总参政治部具体指导下，历时八载，采访一百多人，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而成。书稿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1996年4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现了文革结束后官方为罗瑞卿辩护、正名的立场和观点。强烈的倾向性使该书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严重扭曲了史实。而唐平铸工作笔记所披露的中央、军委有关领导人的讲话，使被颠倒的历史得以再颠倒过来，使原来的历史图像得以真实再现，是对《罗瑞卿传》的有力批驳。

### （一）《实录》披露了毛泽东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论及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批评时称，“（1965年）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毛泽东依据林彪、叶群提供的材料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但是，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后来，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1〕《罗瑞卿传》又称，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以后向罗传达过毛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2〕

首先，《罗瑞卿传》故意没有引全毛对罗的批评。据唐平铸工作笔记，毛的批评全文是：“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3〕。”毛又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其次，《罗瑞卿传》完全无视毛在上海会议以后对罗的多次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包括但不限于：〔1〕1965年12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4〕〔2〕1966年1月5日，毛在南昌与江西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问题时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5〕〔3〕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及彭、罗、陆、杨问题时称，“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6〕

### （二）《实录》披露了林彪等军队高层对罗的严厉批评

对罗的批判，军队最高层尤为激越。如林彪称，揭露罗的问题，是“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7〕危险得

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林的说法比上海会议的结论“与彭黄有别”更进了一步。

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8）撑着。”

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会变色，适当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会完全拥护中央、主席、林总。”

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 （三）《实录》披露了邓小平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传》在引述了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后又称，“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9）

所谓“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其实是毛泽东向罗搞突然袭击。邓岂能“表示不满意”？！邓在会议开始时对罗有一定程度上的袒护，这恐怕不是邓一个人的意见。甚至不排除邓曾经说过“死无对证”一类的话。邓称，“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

罗瑞卿自杀未遂，使中共最高层对其问题性质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罗瑞卿自杀未遂后的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后期，邓的态度如很多人一样发生了突变，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邓4月8日北京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之中。邓称，“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邓又称，“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

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邓称林彪首先察觉罗的问题，“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又批评罗“同林总唱对台戏”，“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这些话，除了表现了邓对林的颂扬和肯定，丝毫找不到其对林“不满意”的情绪。

#### （四）《实录》披露了彭真对罗的严厉批评

彭真是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罗瑞卿传》提及，“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发言时要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他说：‘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他还针对在会上有些人表现得很激动的情况说：‘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是会失悔的，人在火头上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冷下来时，人们还想说什么，很难说。’彭真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10〕

唐平铸工作笔记记录了彭真的两次讲话，均无以上尤其是所谓“失悔”的内容。虽然彭真在1966年4月下旬被叶剑英等指为在批判罗会议过程中表现“恶劣”，但实际上彭真在当时也不得不紧跟毛的步伐，只不过是说过“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一类稍稳重一点的话而已。唐平铸记录的彭真讲话称，“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干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的，甩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 （五）《实录》披露了贺龙对罗的严厉批评

罗瑞卿与老师的关系大都不怎么好，独与贺龙走得还比较近。《罗瑞卿传》在述及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前夕总参党委一位负责人向贺龙反映，指罗是已靠边站的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的后台，被贺否定，又问贺“现在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问题”时，“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这位负责人问贺龙：‘您这个话能不能传达？’贺龙答：‘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11〕

《罗瑞卿传》没有也不会提及的是，上海会议召开以后，贺龙一旦知道毛泽东抛弃了罗，其对罗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变化。因为曾经走得比较近，贺龙对罗的家庭情况，包括有多少电话机子，有多少枪支，均十分知情。一旦知道毛的态度，贺对罗的揭发批判也是十分无情的。根据唐平铸工作笔记，贺在1966年2月至4月间对罗有过两次批评，其一为贺称：“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案情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



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26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林的安全。”其二仅为一句话：“这个人没有改造的人。”

综上所述，笔者不能不认为，《唐平铸文革实录》中抄录的有关京西宾馆批罗会议的发言材料，无疑是《实录》一书中最为精彩、最具史料价值之处。

（2019年1月）

- 1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页540。
- 2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49。
- 3 八司马，指唐顺宗即位时起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改革，失败后参予其事者八人被贬至边远地区分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 4 《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页456。
- 5 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400。
- 6 《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1981年5月。
- 7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下同。
- 8 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四十二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 9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43。
- 10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66。
- 11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页539。

~~~~~  
【史海钩沉】

从周总理的反常行为探寻林彪叛逃真相

• 王贵成 •

在新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迷人风度——儒雅淡定，潇洒沉着。但是自从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后，周总理的表现却极为反常，与那种迷人的风度相去甚远。从周总理的这些反常行为中，正好可以给人们探寻林彪叛逃真相提供一些端倪。

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已死。这时候一件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周总理竟然大哭起来，这是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的，下边是纪登奎的回忆：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

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本来，林彪死了，当时几乎人人都在为党和国家高兴，正如纪登奎所说的那样，周总理也“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为什么堂堂一国总理却这么失态，要为“叛党叛国”死去的林彪大放悲声号啕痛哭呢？如果林彪真的像官方说的，是个“叛党叛国”“篡党夺权”的大坏蛋，政治立场一向坚定正确的周总理会和他的死感到悲痛吗？这样看来，林彪并非官方描述的那么坏，而且似乎与周总理的感情也非同一般，周总理才可能为林彪之死感到如此悲痛。尤其应该注意周总理说的这样一句话：“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似乎话中有话。“事情不那么简单”，难道林彪之死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样，是“叛党叛国”，是“自取灭亡”？难道林彪之死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版本？再说，林彪已经死了，他和他的死党从此不会再干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事情没完”？这只能是说像整死林彪类似的事情还没完，那些整死林彪的人以后还会继续整人，而且下一个很可能整到周总理的头上。在中国谁能有这样大的能量呢？据此可知这个整死林彪的人是谁就不难想象了。虽然周总理作了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回家就把自己与林彪一家的大量合影照片全部烧了，但“批林批孔”运动还是照样很快就转化为“批周公”，这说明周的预感没错。

最反常的事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信任。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

10月10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我们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他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又反复盯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越长江时，我告诉总理要过长江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他找到下面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觉得不放心：“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我忙把地图递给他：“总理，是长江，没错。”他拿着图和我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了点头。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周总理坐飞机竟然对机组人员产生了如此的不信任，说到底是对飞机飞行方向的担心。周总理不对“被导弹打下来，飞机没油自己掉下来，被毒死、被枪打死、被车撞死”产生担心，而只是担心飞机的飞行方向。一般人坐飞机很少有人会出现周总理式的担心，有几个飞机乘客会不停地朝窗外张望，时刻关心飞机飞错方向的？周总理以前坐飞机也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这只能说明周总理的“担心”是从林彪飞机出事吸取了教训。

周总理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9·13事件的明线，即毛泽东一周总理—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却忽视了同样至关重要的一条暗线，那就是毛泽东—汪东兴、张耀祠—林彪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要知道，即便是林彪，周总理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驶员”，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而且通常都负有特殊使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粉碎“四人帮”逮捕江青等人时，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就事先通知了江青等人的警卫员，要他们配合行动。同理，如果最高层要对周总理、林彪有所动作，他们的警卫员一定会比他们的首长先知道，而且会坚定不移地配合最高层的行动。

9 • 1 3 事件发生以后，成百上千的只是因为组织关系执行林彪正常指示的人都被打成了“死党”，积极主动、处心积虑的执行林彪“叛国”指示的专机机长潘景寅却没有被定性为林彪“死党”，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256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善良的人们不禁要纳闷了，潘景寅凭什么能获此殊荣呢？

从被潘景寅甩下地的副机长康廷梓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潘景寅当晚的一系列举动是一种主动行为，在林彪一家未到机场前，不可能有人拿着枪威胁他做这些事情。相反，林彪的“死党”李作鹏向机场传达了周总理“不能让256号起飞”的命令，吴法宪更是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也就是说，即便是林彪来了，飞机也是起飞不了的，可最后的事实却是，潘景寅当晚的举动非常反常，能去睡觉却偏偏不去睡觉，有意在等着什么人的电话。果然在当晚12点05分潘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这个电话不可能来自林彪或叶群、林立果，因为林彪等人还在汽车上，当时没有手机根本无法与机场联系。接到这个电话后，潘景寅在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不仅自己不去叫醒绝对不可缺少的副驾驶，而且也不让机械师和值班室主任老李去叫他们，用康廷梓的话说就是“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故意违反三叉戟必须两人同时驾驶的规程，甩下睡在隔壁房间的副驾驶和领航员强行起飞了。如果潘景寅如此积极主动、处心积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执行林彪的指示，那他必是“死党”无疑（康廷梓就是这么认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查出12点05分潘接到的这个神秘电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是林彪或其死党打的电话，早作为叛国证据公布出来了，可官方一直避而不谈，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而且，不带副驾驶和领航员显然是想置飞机于死地的故意行为，是别有用心的，这种自杀式的命令不可能来自林彪。那么，是谁下的这种命令呢？谁有更大的权力敢让潘景寅违抗李作鹏、吴法宪、周总理的命令进而走上这种自杀式的道路呢？

这只能说明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是肩负特殊使命之人。这也是他没有被定为林彪死党，而能让邓小平高度评价为“好人”的原因。基于此，周总理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不信任感就是极其自然之事。

由此可以推断周总理肯定知道林彪“叛逃”事件的真相，分析起来，无非有三种情况：一，周总理是林彪“叛逃”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二，周总理不是林彪“叛逃”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三，周总理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是，根据自己看到的种种现象，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天才的智商以及对红太阳身边诸多人物的了解，判定林彪是“被叛逃”的。

而从林彪死后周总理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说明周总理不是制造林彪“被叛逃”事件的主谋，但周总理知道谁是主谋，周总理即使做了些什么，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林彪不是“被叛逃”，而是像官方所述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搭乘专机的首长林彪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总理就不会出现这种担心。其实，周总理是在担心，即使作为专机首长的他本人不主动故意叛逃，但只要专机飞错方向，他一样会遭遇和林彪一样“被叛逃”的悲惨下场。

□ 来源：新浪博客

~~~~~

【难忘岁月】

## 复旦往事（选载之六）

• 吴中杰 •

（上接 1910b）

罗店的气氛也非常紧张。本来，下乡劳动正是休息脑子的好机会，大家说说笑笑，较为轻松，但这时，人们都失却了笑容，紧绷着面孔准备战斗或者挨斗。没几天，复旦校革命委员会就在罗店剧场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工宣队队长张扣发做报告。他把复旦描绘成遍地都暗藏着反革命，形势严重极了，说要发动群众把那些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决不能手软。他特别点出了“胡守钧小集团”，说这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反革命集团，要重点打击。胡守钧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过一个“孙悟空”战斗组，他本人外号叫老猴子，张扣发就把“胡守钧小集团”比作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来的孙悟空，说他们有些人已经钻到我们革命委员会内部，钻到共产党内部，是定时炸弹，非挖出来不可。“一打三反”运动的目的，就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张扣发很得意地宣布：“老猴子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一批小猴子也要一个个挖出来，我们还要把他们后面那些额头上有皱纹，嘴巴上长胡子的人挖出来。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埋藏得很深，你们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现在就有一人坐在台下，他是中文系教师，是个刁德一式的人物，是为‘胡守钧小集团’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这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我们老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你与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王志惠几个人在阳澄湖一条小船上讨论建立反动政党的事，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是赶快缴械投降吧！同志们！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前几天，我们派人到他家去检查，什么也没有查到。这家伙嗅觉很灵敏，一看形势不对，头天晚上就大烧黑材料。其实我们早已把他的房子监视起来了，头天晚上半夜里眼看他在厨房里烧材料，但因为没有接到搜查命令，所以不能动手。这样的反动家伙，家里怎么可能没有黑材料呢？我要警告这个家伙，不要以为查不到黑材料我们就整不了你，你走着瞧吧！”

这个呼之欲出的人物，许多人都听得出来，指的就是我。我自己当然也心中有数，知道他们这回是要把我放在“胡守钧小集团”里整了。不过，我倒并不太紧张，却反而感到有点滑稽。张扣发所说的两条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叫我怎么能认真对待呢！

首先，我根本没有到过阳澄湖，也就无从在湖上划船，更谈不到在船上讨论建党之事。船上开会建党，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做的事，这是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情节不知怎么会移植到我们身上来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钧他们会干这种事。王志惠这个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游山玩水。

再则，说我在工宣队搜查的头天晚上在厨房里烧黑材料，那更是活见鬼。我是头天晚上从南京乘夜车回来的，半夜上车，天亮抵沪。他所说的监视人员看见我烧黑材料的时间，我大约还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车上，根本不可能在复旦宿舍里。

这两条“罪证”，只要我一开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两条假材料来吓倒我，真是异想天开！张扣发这个讲话，倒让我看出了他们的虚张声势来。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如何能预先断定别人是反革命？连搜查不到罪证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这岂不是颠倒的逻辑？

但是，不管是真罪证还是假材料，不管是颠倒的逻辑还是逻辑的颠倒，只要有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行。在那个年代里，真理在权力面前显得分外的软弱，人们也不能在真理

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真理也就丧失了客观性，而只有阶级性，凡是对权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于是，真理服从权力，权力即是真理。尽管张扣发的讲话充满了逻辑的混乱，他的结论是建筑在假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因为他代表了权力者的意志，他的话就具有实际的效力。

散会后，刚走出会场，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两名学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这两名学生就与我住在同一房间，吃饭、上厕所都跟着，而且留意观察我的态度。我竭力保持平静，不与人谈话。我知道，工宣队希望看到我紧张得吃不下饭，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惶惶然不可终日，然后主动找他坦白交代——就像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偏不。我照样读书，吃饭，晚上呼呼大睡，就像无事人一般。

终于，管辖我们小组的工宣队小组长刘家国耐不住了，第二天就来找我谈话。也许是张扣发等着他去汇报动态，他不能不找我谈话。

刘家国先问我对昨天的大会有何感想，然后点到正题说：“昨天张扣发同志点到的那个摇鹅毛扇的中文系教师，你看是谁啊？”

我当然无需躲闪，直截了当地说：“这个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点不像。在中文系教师中，要说与胡守钧他们有来往的，当然是指我；但是张扣发同志所说的那两件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又不像我。”

接着，我就把我从未到过阳澄湖和工宣队来我家检查的头天晚上我还未回上海的实况说了一遍。

刘家国组长认定我有罪，不相信张扣发讲的不是事实。我则死咬住我没有去过阳澄湖，因而无从在湖上讨论什么问题。我要求核实材料，并表示愿意当面对质。结果是僵持很久，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时，刘家国严厉地对我警告道：“吴中杰，现在你被我们揪出来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想抵赖也是赖不掉的。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以为你将材料烧掉，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们可以从零打起，不信你等着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一贯的肃反政策，后来扩而大之，对每个审查对象都要交代一番。这条政策，对于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确是有用的，但对我们这些无罪而挨整的人，却实在并无效力。我没有罪，叫我从何坦白？难道摆出事实来申辩就叫抗拒？就得从严处理？而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再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就算态度好，应该从宽处理？这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们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调查研究入手，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再下。这不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吗，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却从乒乓球运动员那里搬来个什么“从零打起”的办法，岂非荒唐？乒乓球运动员讲“从零打起”，是要丢掉冠军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是取胜之道；而工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孔，不苟言笑，原则性强极了。看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非要选择一些狠天狠地的斗士，这才能贯彻他们路线斗争的意图。

那年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很难。弄不好，就要惹火烧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学习班”上，我就亲身尝过味道。那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本来不是清我的，因为我并无什么历史问题，也无现行罪行。学习班开始后，点了许多老师的名，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从旧社会中来，上层关系又多，这就有得好交代了。这种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楼”。因为都是陈年老账，他们在思想改造等运动中早已交代过多次，所以引发不起轰动效应。接着，清队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这一下就热闹了。揭发者指控某人是假党员，被揭发者则声称自己是真党员，双方正在大会上激烈争论时，清队组成员周某某站起来，抛出了几份调查材料，说明某人既然没有宣过誓，连介绍人是谁也成问题，所以就给他下了假党员的结论。接着是大字报贴满教学大楼，大标语刷满复旦校园，这个“假党员”就这样被揪出来了。但我听了周某某宣读的材料后，觉得此案难以定性。因为这些材料只不过提出了一些疑点，并不能证实他是假党员，当然，这位当事人的辩词也很无力，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真党员。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续不完全，未必是假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凭这些不过硬的材料来下结论。但这种意见在当时是不能随便说的，一说便是破坏清队运动，而且人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很多人只相信领导的话，并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这使我很吃惊，也很恼火，马上站出来自我辩护，声称我的看法是合理的。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变成了中文系清队的重点对象，许多原来与我较为接近的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起来揭发我。总的罪名是：反对工宣队，破坏清队运动。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为为他辩护而惹祸的那位“假党员”，也站出来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阶级敌人，破坏清队运动。这种反戈一击的举动很受工宣队欢迎，当然，他自己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

见过许多此类事件之后，聪明的人谁还愿意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呢？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狠批乱斗才能取得领导信任。

但这次运动来势太猛，很有点使师生员工人人自危，人们一下子还不敢太积极。

而且，驻扎在乡下，各生产队毕竟太分散，运动无法搞得轰轰烈烈，所以在动员大会之后没几天，全校师生一律调回学校搞运动。

校革会一声令下，大家马上卷铺盖、上汽车，别是一番战斗气象。谁也不敢问一问“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还要不要执行？随时准备打仗的战备措施怎么落实？好在教师学生们本不愿长期住在乡下，而头头们原也只是为了执行指示而疏散，现在既然有更紧迫的任务，当然就不管备战不备战了。

每次下乡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更衣，然后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但这次回校，我却享受不到这种小小的乐趣了。还在上车之前，刘家国就通知我，到校后不准回家，住在学生宿舍。所以，当教师们都拎着行李纷纷回家团聚的时候，我只好跟着学生上六号楼宿舍。我们一家三口人此时分成三处，上海只剩我一个人，回不回家原无什么关系，但此刻不准我回家，我倒很想回去看看。我借口拿换洗衣服，需要回家。刘家国虽然摆出一副很难看的脸色，但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放我回去。当然，他没有忘记派一个人跟着。

这个跟着我的人是一年级学生，我虽然没有教过他的课，但与他相处也有一年多了。工宣队进校后，说教师在一起干不出好事情，拆散了教师学习组，将教师都分配到各班级学生小组中去。这位同学不但与我一个学习小组，而且还在一个劳动小组。去年夏天到上钢二厂战高温时，我们一起在转炉下清除钢渣。这是最累、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一不留神，便会被钢渣溅伤，甚至烧死，所以我们非得互相照应不可。他开始对我很严厉，日子一长，也就随和多了。在劳动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晚上下了中班，夜深人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马路上行走，他忽然叫了一声：“喂！姓吴的，走慢些，我有话跟你说。”当时学生已不愿、也不能对我们叫“老师”了，一般是直呼其名，客气一点就叫“老吴”、“老王”，这位同学却是别出心裁，一直叫我“姓吴的”。

我吃不准他有何见教，只好洗耳恭听。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姓吴的，你不要以为这次劳动是随便分组的，我是工宣队特意派来监视你的。他们要把你分配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所以也就苦了我。刘家国交代的，说你是坏人，要我暗中监视。我跟了你三个月，发现你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我甚至对你有些佩服。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陷害你，但总得汇报些情况，你得心中有数。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交朋友，但现在不能。工宣队总想要整你，不是我能说服得了的。如果一发现我与你亲近，他们马上会另调一个人来监视你，对你也不利。”

我虽明知工宣队对我很歧视，但以为既已整过一次，又整不出什么名堂，总该可以歇手了吧，没想到他们这样看重我，连特工手段都用上了。所以听了这些话，也还是微微吃惊。派来监视我的学生因为出身成分好，所以受到信任，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根据实际接触，对事物持有自己的看法。承蒙他对我的信任，我自然很感谢他，但决不愿连累他，所以也不想与他亲近。这样，他一直担任着监视我的任务。随着我由暗中被监视转为明的被隔离，他也由暗的监视员变为明的看管员。

他一路上跟着我，保持几步的距离，别人既看不出他是监视我的，也不会疑心他是我的同行者。到家之后，我随手把门关上，想与他说几句话，但他马上把门打开，并警惕地到门外看了看，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不能关门，可能还有监视的人，也许有人会告密，说我们关着门说私房话。得敞开门说话，才不会犯疑。”

我很佩服他的见地。小小年纪，难为他想得周到。

我看见地板上有几封信，是我不在家时邻居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我赶忙拆开来看，有两封是朋友来信，无甚要事，一封是高云从黑龙江边写来的，说他们在严寒中战天斗地的情况。她革命热情很高，要我争取尽快到黑龙江去。她哪能料到，我此时已成阶下囚，别人早已不承认我是革命群众了，也不要我革命了。我看过信，照例要撕毁，但被这位同学制止了。

“不能毁！刘家国特地要我看看有没有信，有信要交给他。”

虽然我们大家都学过宪法，知道人民有通信自由，但这时连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都不讲了，他们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抄了我的家，限制了我的行动，还谈什么通信自由呢！何况这等事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淫威所在，谁敢抗议就罪加一等。事情颠倒到这个地步：捍卫宪法者有罪，践踏宪法者执法，复有何说！我只苦笑一声，把信交了出去。

他接过信去，说道：“这次运动来势凶猛，非同小可。胡守钧案子是全市重点大案，工宣队把你挂在这个案子里搞，是决心要把你整倒，使谁也不敢讲话，要逼得大家都揭发你，使你众叛亲离，在精神上压垮你。到时候你千万不能自杀。”

“我干么要自杀？死了就搞不清问题了。我还得活着看看事情的结局呢！”

“这样就好。我仍旧相信你是好人，但是随着你问题的升级，我也只得跟着骂你，以后我们也不会有单独谈话的机会了，你自己珍重！”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在我的脸上被随意涂上白粉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相信我是好人，而且这人又是工宣队依靠的对象，是监视、看管我的红卫兵，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人心自有公道在！

家里不便多留，我简单地拣了几件衣物，就匆匆地跟他回学生宿舍了。

（未完待续）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